

# 多拉报告

(匈) 拉多·山多尔 著

柴鹏飞 译

群众出版社

11.241/18

943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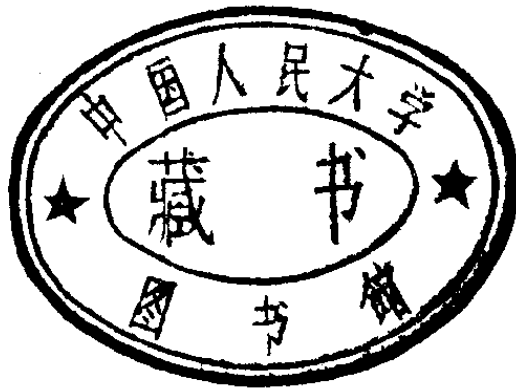
# 多拉报告

(匈) 拉多·山多尔 著  
柴 鹏 飞 译

0152/3



80107559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 多拉报告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46千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印数：00001——70000册 定价：1.10元

## 关于本书作者

拉多·山多尔 (Radó Sándor) 一八九九年生于匈牙利。早年在布达佩斯攻读法律，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在奥地利和德国学地理。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在维也纳任“俄罗斯通讯社”社长，一九二三年在德国活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在苏联。自一九二七年开始先后在柏林、巴黎及日内瓦开设新闻社并自任社长。其间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四年在瑞士领导苏联的一个间谍组织，搜集德国的军事情报，因有功获列宁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苏联因错案被监禁十年，恢复名誉后于一九五五年回匈牙利任大学地理学教授兼匈全国地理、地图局处长。

拉多为地理学博士，匈科学院地理学分部主任，并兼任匈地理学会会长。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及法国、苏联、美国 and 民主德国等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国际地图学会一委员会主席。一九六三年及一九七三年两度获匈最高国家科学奖金。

《多拉报告》为作者的回忆录，已译成十七种文字出版。其中一九四二年秋至一九四三年秋一段已摄制成电影。

本书根据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 (Kossuth Könyvkiadó) 一九七八年《DÓRA JELENTI...》第四版译出，并作了一些删节。

## 前 言

近年来，有不少文章和书籍问世，谈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活动，应该说，其中相当一部分作者是出于追求轰动的目的。在这些充满夸大和歪曲真象的作品中，两个法国记者——皮埃尔·阿科斯和皮埃尔·盖——一九六六年出版的《战争在瑞士取得胜利》一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本书中，他们力图说明：苏联之所以能在大战中获胜，主要不在于红军在战场上的战果，而应归功于苏联情报机构中瑞士小组的活动。对战争结局的这一耸人听闻的分析，引出了一批新的文章和专门著作。尤其在西德更是如此。那里的一些反动分子——原来的纳粹残余及其新信徒——至今不愿承认他们败于苏联军事上的优势这一事实，而宁可把失败归咎于希特勒军事指挥上的愚蠢，或是抱怨“俄罗斯的严冬”；也有人说：对被占领区的居民过分虐待促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失败。而现在，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极为荒唐的解释。他们说：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德国最高统帅部中有那么一些人在德军背上插了一刀——把所有的军事计划都出卖给苏联情报机构了。这种“内敌致命”的说法其实并不新鲜。当年，德帝国主义者曾力图把国内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反战运动说成是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原因，而并非由于在战场上输给了协约国。现在，这些人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又在“内敌致命”的理论上寻找第二次世界大战惨遭败北的

原因了。

应该承认：在战争结束二十到二十五年以后，当年在瑞士的这个情报组的活动居然引起如此轩然大波，而我本人，作为这个组的组长也备受注意，起初我是深感惊讶的。我之惊讶还由于：如果德国反动分子认为情报工作既然如此法力无边，那么为什么不能正视这样一个现实：第三帝国的情报机构何以不能在红军背上也插上这么一刀呢？看来，他们之所以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答案太简单了，是因为德国情报机构一事无成的命运是注定了的。苏联人民为捍卫祖国和自由而进行的团结一致的战斗以及苏联反间谍机构的警惕性，粉碎了敌人在这方面的一切尝试。同样，他们也无法正视另一个现实：为什么有这样多的德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甘冒生命危险来帮助苏联，而没有那么多的苏联人来帮助法西斯？我的小组成员中，共产党员屈指可数，但与法西斯势不两立的信念，把我们所有的人——无论你是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或是民主人士；无论你是瑞士人还是德国人，是奥地利人还是意大利人，是法国人、英国人还是匈牙利人——都紧紧团结起来了。这个反法西斯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在今天依然存在，而这正是光明未来的保障。不久前我收到瑞士一位建筑师的来信，他写道：“在《洛桑日报》上我读到了您和您的小组为人类作了这么大的贡献。实际上是您使我免陷法西斯的魔掌。因此，我终生将对您深怀感激。”当然，这个感激之情应该由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每个战士所分享，而其中首先是苏联人民及其军队。因为是他们肩负了战争的大部分重担。再听听汉斯·豪萨曼少校（关于他，书中还会提到）几年前在苏黎世电视台的讲话吧。这位对共产主

义并无好感的瑞士情报军官说：“对我说来，问题是这样清楚地摆着：如果纳粹德国取得大战胜利，那么瑞士就要遭殃。所以必须努力使德国失败。”就是这个逻辑推动着德国和整个欧洲的许多人为推翻希特勒政权和粉碎纳粹制度而不惜肝脑涂地。

其实在年轻时，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当情报人员。搞情报是极为复杂的工作，要求有极好的素养。情报人员要上过特别的学校，接受各种训练。而这些条件我都不具备。尽管那些为我写“传记”的作者从来也不相信这点。实际情况是：我从来也没有受到过这方面的特殊训练。

对我说来，科学研究工作始终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当我排除万难，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时，我是幸福的。但我的生活是和另一个目标联系着。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投身于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国外渡过了几十年漫长的流亡生涯，做着地下工作。这些日子当然也就成了我一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国家为党工作这一经历，使我学会了做秘密工作的本领。从而使我有可能在日后更为复杂和更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战斗。

对于要不要写回忆录，我曾长期犹豫。因为我总觉得，自己只做了一些份内之事。同时也不愿因为出版作品而引起人们对我的注意。但是近年来谈论瑞士组和我个人的不少书籍，充满了大量失实、甚至歪曲的东西，终于促使我写一本回忆录，争取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拉多·山多尔

一九七一年于布达佩斯

## 目 录

前言.....	( 1 )
我是怎样成为情报人员的.....	( 1 )
Geopress新闻地图社.....	( 11 )
世界的中央.....	( 15 )
在法西斯意大利.....	( 20 )
派克博.....	( 27 )
失去联系.....	( 35 )
世界上最大的监狱.....	( 38 )
南斯拉夫之行.....	( 46 )
爱德华、毛德和金.....	( 50 )
西西.....	( 54 )
希特勒什么时候发动进攻? .....	( 58 )
巴巴罗萨计划.....	( 66 )
莫斯科会战.....	( 76 )
罗莎和新的消息来源.....	( 89 )
敌人在准备.....	( 94 )
第一批危险信号.....	( 114 )
向高加索方面的攻势.....	( 120 )
泰勒.....	( 127 )
保罗的护照.....	( 133 )
发报机和短波发生器.....	( 137 )
罗莎的“朋友” .....	( 140 )
舒伦堡出场.....	( 146 )



露西.....	( 149 )
维特和其他人.....	( 156 )
特别行动小组的行动.....	( 169 )
斯大林格勒会战.....	( 174 )
胜利和忧虑.....	( 181 )
舒伦堡再度出场.....	( 191 )
最危险的对手.....	( 200 )
决战前的准备.....	( 209 )
幕后外交.....	( 220 )
英格和米基.....	( 227 )
敌人的圈套.....	( 236 )
面临决战.....	( 245 )
库尔斯克会战前夕.....	( 257 )
茨威格——拉莫及其他密探.....	( 266 )
盖世太保的罗网.....	( 273 )
“F”机关有多少材料？.....	( 278 )
库尔斯克会战.....	( 281 )
帮凶们发慌了.....	( 296 )
达摩克雷兹之剑.....	( 305 )
马丁夫妇.....	( 315 )
失事.....	( 318 )
转入地下.....	( 327 )
金也被捕了.....	( 335 )
自我监禁.....	( 342 )
逃离瑞士.....	( 352 )
后话.....	( 359 )

## 我是怎样成为情报人员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因为一件学术上的事，我从巴黎前去莫斯科。

当时我长住巴黎，经营“独立新闻社”(Agence de presse Indépendante)。

“独立新闻社”的业务是发布消息，揭露在德国猖狂不可一世的法西斯主义和正在东山再起的德帝国主义侵略野心。这些消息一部分通过秘密途径来自德国，另一部分则是根据德国自身的报纸——主要是地方报纸——上刊登的大量逮捕、判决、谋杀的消息加以分析加工而成。这个小新闻社人员不多，但每天发行法文、英文和德文电讯稿。编辑们自己打印蜡纸，然后复印。每人都是多面手。

我们的活动对德国法西斯分子说来当然有如芒刺在背。希特勒本人在一次讲话中破口大骂，把“独立新闻社”抬举为第三帝国的头号公敌。纳粹报纸一拥而上，对我们大肆挞伐，百般咒骂。于是我们新闻社的名声不胫而走，地位蒸蒸日上，终于从设备简陋的小房子乔迁进了法国最高级的爱丽舍大楼里办公。打开窗子，迎面是英国驻法国大使馆。共和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也离这里不远。

顺利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法德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法国当局乐于见到我们把德国人刺激得暴跳如雷，因此从未对我们的工作设置任何障碍。但当南斯拉夫

法西斯分子暗杀了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图以后，情况急剧变化。直到现在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三四年十月的那个阴沉的下午，透过蒙蒙的细雨，报贩的叫卖声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南斯拉夫国王和法国外长在马赛被刺身亡。当时我正送朋友前去巴黎的里昂车站。在我们路过克里隆旅馆时，阳台上南斯拉夫的国旗依然在雨丝中飘扬，而我们却以沉重的心情讨论着这事件可能引起的后果。

果然情况慢慢地不利于我们了。过去为我们提供大量捐款的法国反希特勒的大资本家，对于我们不加掩饰的反纳粹活动不免有所顾虑而逐渐停止了捐款。在有影响的犹太人士中基本上也是这个情况。

此外，在一九三五年，法国左派统一战线——“民族阵线”的力量日见壮大，进一步加强了法国大资产阶级和犹太资本家对我们这些外来的流亡共产党人的疑虑。当时皮埃尔·赖伐尔出任法国新总理。此人后来在维希政府<sup>①</sup>中也曾充任总理，因此他会执行什么政策当然不难想象。

但情况远非法国一家如此。在邻近的英国，一方面忧心忡忡地看着法西斯分子耀武扬威，而另一方面则对希特勒的反共反苏政策感到满意，尽管希特勒的政策不但对准左派运动，而且也明显地开始触及了有钱的犹太人。

我们的工作条件越变越困难了。

---

①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国战败投降。根据停战协定，法国大部分领土由德国占领。法国南部一部分未被直接占领的地区成立了以贝当为首的傀儡政权。这政权的“首都”在维希，即所谓“维希政府”。本书在后面有时读到的“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也就是维希政府控制的这块地方。——译者注

法国和英国领导阶层对法西斯的让步，迫使我开始考虑是否需要结束“独立新闻社”的业务而专心从事地理和地图科学研究工作为宜了。在侨居法国的这段时间里我从未间断过科学研究。我在巴黎地理学会专业刊物编辑部担任职务并经常为法国报刊绘制形势地图，同时也参加《苏联世界大地图》的一部分工作。本章开始所说的一九三五年莫斯科之行就是与此有关的。

过去我曾多次去过莫斯科，还在那里工作过几年。第一次是一九二一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聆听过列宁的讲话，还曾有幸和他作过一次交谈。

这次到达莫斯科后，我首先到拉津街《苏联世界大地图》编辑部。在那几乎是摇摇欲坠的古老楼房里见到老朋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巴朗斯基。他是《苏联大百科全书》地理部主任。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我也撰写过好几个词条——《匈牙利》这条就出自我的手笔（词条中的政治部分是库恩·贝拉<sup>①</sup>写的）。

我还拜访了好几位匈牙利和德国同志，就“独立新闻社”是不是继续办下去的事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不料事情向另一方向发展了。

几天以后，有个从事新闻工作的匈牙利同志到旅馆找我。他说，他向一个在红军总参谋部的熟人谈了“独立新闻社”的情况。红军参谋部的这个人认为，如果我放弃经营反正已经没有希望的“独立新闻社”，从事别的工作，将会对

---

① 库恩·贝拉 (Kun Béla)，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和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之一。——译者注

反法西斯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要是我愿意，他可以负责引见。

老实说，关于这个“别的工作”我本来一无所知。记得一年前就《苏联世界大地图》的事前来莫斯科时，我曾在布拉格餐厅见到过在柏林结识的老朋友理查德·佐尔格<sup>①</sup>。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是苏联情报机构的人员。在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直到几十年后才了解到他今日已为世所熟知的英雄业绩。

在《苏联世界大地图》编辑部我有一个才气横溢的青年助手玛亚·贝尔齐娜，她的父亲扬·贝尔岑是拉脱维亚有名的革命家，当时是苏联国家档案局局长。当我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遇见他时，也从未想到他不久前还是红军情报部部长。

我决定接受这位匈牙利同志的建议。因为我想，在苏联红军这样一个大集体里和法西斯进行战斗，其条件和小小的新闻社，当然是大不相同的。

于是我生活中新的一章开始了。

这位匈牙利同志在约定的时间领我前去和红军情报部负责人之一阿尔图佐夫见面。阿尔图佐夫告诉我，情报部长谢苗·彼得罗维奇·乌里茨基想和我谈谈。乌里茨基在革命胜利前就参加了党，是个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时期在察里津担任第十四集团军参谋长兼作战部长。阿尔图佐夫一谈起他，真是敬仰备至。

一个身材敦实、给人以沉着坚毅之感的四十来岁的中年

---

<sup>①</sup> 理查德·佐尔格 (Richard Sorge)，德国人，苏联间谍，曾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译者注

人走进屋来。他胡髭修得很窄，显得很有精神。胸前两颗“红旗”勋章闪闪发光。略事寒暄后，谢苗·彼得罗维奇转到正题。看来他对我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

“听说您的新闻社遇到了一些困难，”乌里茨基说。

“是这样。要经营下去确实有不少困难。特别是如果爆发战争，那肯定会被迫停止活动。”

于是我介绍了一些情况。

乌里茨基凝视着我，似乎在思索一个问题，额上皱起深深的沟纹。

“就这么办，”他说，好像在对自己的思考进行总结，

“他们告诉我，您愿意帮助我们工作。那么，恐怕需要换个国家居住。让我们考虑一下您去哪里比较好。”

乌里茨基站起身来，点了支烟，在屋里踱来踱去。

“希望您能看到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和完成这项工作的复杂性。您过去做过地下工作，进行秘密活动对您并不陌生。但对于情报工作来说，秘密活动并不是一切。我们要善于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中辨别方向，因为情报工作本身就是政治。首先要准确地判断在某一特定时间里，谁是我们军事上的对手。情报系统只是在确定对手后才进入行动。您也知道，苏联在欧洲有好几个潜在对手，但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我们就是根据这一客观形势制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情报工作指导思想的。”

“这是就一般而言，”他坐到我身旁，继续说道，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您到哪里最好。我知道，您懂好几国语言。那么您打算到哪里去？拿什么工作做掩护？”

“我想，”我答道，“如果我开设一家新闻地图社，找

个地方也许不困难。在德国我曾经经营过一个名叫“Press-geographic”的新闻地图社。在法国也办过，名叫“Geopress”。至于这个新的地图出版社，以到比利时或瑞士去开办最为理想。因为瑞士大概不至于会参战。但要弄到开业许可证，则是比利时比较容易。我想可以先在比利时开业，然后迁到瑞士。这样似乎妥当些。”

从乌里茨基和阿尔图佐夫的谈话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对苏联说来，未来最大的危险来自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这两个国家正在不遗余力地搞战备，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大肆进行军国主义和反共宣传。一旦战争爆发，它们就可能是苏联的主要对手。因此苏联情报工作的任务就是密切注意它们的动向，及时了解法西斯领导人的秘密反苏计划。

于是，这也就是我的任务了。可惜不把我派到德国去。在那里我做过多多年地下工作，对情况熟悉。但这样做当然不可能，因为纳粹分子认识我和我的妻子莱娜，大概用不到等我们开始活动就会把我们抓起来。所以最可行的办法是：在一个和德国接壤的国家，就像我所建议的那样，在比利时或瑞士定居下来，在那里进行组织工作，而在德国境内搜集原始材料。这样，一旦德国和意大利发动战争，我就可以不必担心德国军事反间谍局或盖世太保<sup>①</sup>的活动，因为在中立国，他们对我们无可奈何。

最后，我们商定在比利时找个地方安顿下来。这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西欧各国之中，以比利时的物价最低，有利于地图出版社开展业务。

---

① 德国秘密警察。——译者注

红军情报部于是决定我离开法国，在比利时作为一个地理—地图学家开设地图出版社。当时在学术界我已小有名望。因此，将此计划付诸实现看来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带着这个指示离开了莫斯科，就这样开始了变幻莫测的新生涯。

在巴黎结束了“独立新闻社”的营业以后，于十二月首途前往布鲁塞尔。到达后，我立即拜访市警察总监，自我介绍，陈述原因，表示想在比利时开设新闻地图社，申请居留许可。总监一言不发地听完我的话，然后给了两个字的答复：不行。我反复申说：我之所以选择比利时，而不是别的国家，是因为这里工作环境好，科学情报交流工作井然有序；同时本社以绘制形势地图为主，当前世界上对形势地图的需要日益增加，所以开设这样的业务单位对比利时也不无裨益。但虽然我巧舌如簧，而他却丝毫无动于衷。

离开布鲁塞尔之前，我到离城市不远的滑铁卢作了一次小小的旅行。一八一五年在这里的一场交锋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使世界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一个严寒的日子，四周子无一人。我独自凭吊了记载着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如何一败涂地的遗迹，同时想着我应该怎么办。在这拿破仑身败名裂的战场上，我陡然惊悟，在新的生活中我已经遭受了第一次失败。

回到巴黎后，我把情况写成报告，交给在莫斯科时介绍给我的联络员。

答复很快来到：按商定的第二个方案办——到瑞士去。

在当时，只要有足够的钱，任何人都可以在瑞士得到居留许可。但常有这种情况：有些有钱的外国人在瑞士买了房



子，甚至置了地产，于是得到了居留许可，但却找不到工作。要得到开店经商或其他方面的营业活动许可证，要困难得多了。

居留许可证由各州地方政府签发，但必需得到瑞士联邦政府的批准。我打算在日内瓦开业。因为国际联盟办公机构在这里，是国际政治中心。一个从事科学情报业务的新闻社在这里是最合理、最合适了。国联在日内瓦有庞大的图书馆，过去我也多次来过这里。在法国，对我最有用的“中央统计局图书馆”在那时根本不开放，因此有国联图书馆，对我说来是很宝贵的。

顺便说一句，在法国，当时对图书的管理杂乱无章。记得有一次我前往座落在黎希留大街金璧辉煌的“国家图书馆”，在目录厅，我兴之所至随便查查这里收藏有列宁的什么著作。在人名索引的卡片里我大吃一惊地发现把列宁列入医学著作的作家类别里。原来列宁的“医学”著作是《论共产主义幼稚病》一书。现在列宁的著作在法国也相当普及，我想这张卡片现在总不至于还在医学科学类里放着了吧。

当时日内瓦州是社会党人执政，不费什么口舌我就得到了居留许可证。因为我说，我的学术工作希望得到国联新闻处的支持；而国联新闻处也确有人为我就此事向他们说项。但在首都伯尔尼，为了取得联邦政府的批准就困难得多了。联邦警察总监一听说我打算在日内瓦长住，就颇感不悦。他说：“在日内瓦的外国人太多了，特别是法国人多，多得快要超过瑞士人了。”但是我的理由——我的工作需要得到国联新闻处支持——却很有说服力。他考虑了半晌，终于说，他只能批准对瑞士国民经济有利的单位开业。至于怎样才能对